

阅读观

张伟

今天,未必所有人都能拥有一个价格不菲的电子阅读器。但你在拥挤的地铁里打开手机阅读一本传奇小说,或者对着电脑用鼠标拖动一本畅销书节选时,电子阅读正不可避免地降临到普通人的生活中。

甚至,关于传统书籍和电子书籍谁更可读的争执,也已经展开。有人表示,自己仍然无法接受阅读电子书,而更喜欢传统纸质书在手指间翻过的感觉;也有人坚称,传统出版物定将消亡,电子阅读代表未来的希望。

不管用什么读,书还是那本书

转移的。

无论是在蕴含最新科技手段的电子阅读器上,还是在朴实或装帧华丽的传统书本里,一本书不会教会人不同的东西。如果说阅读所追求的本质是内容,那么,这个内容是由油墨印刷在纸张上,或是由“电子墨水”显示在电子屏上,又有什么区别呢?

阅读工具改变的是阅读者的附带体验。喜欢传统书籍的人,或者是习惯了书

性作用之后,阅读手段就退隐了,书的本质开始显现。

当然,读书历来是一件掺杂着多种复杂情感的事。所以,坚持传统阅读的人和将传统书本换成一个薄薄的电子阅读器的人,都能找到合理的理由。这些理由都是私人性的,都值得尊重。如若将这些私人选择对立起来显然很不明智。

作为产业的电子书出版,是出版商和销售商占领市场的一种新策略。但对读者而言,过分纠结于传统书籍和电子书籍的优劣,恐怕不是件好事。但愿对阅读方式的过度关注,不会掩盖阅读内容本身。因为毕竟,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来读,书还是那本书。

启功式的文人谦卑还残存多少?

独立书评

桂杰

有人说“认识一个人可以从一本书开始”,对此,我深信不疑。每当有文化名人谢世,各类媒体上都发纪念文章无数,试图用各种方式还原或是勾勒那人,各色人等纷纷站出来赞许、表扬、评述若干,然而,我总是觉得还离那人有很远的距离。

启功是我喜爱的书法家和文化名人,阅毕新近出版的《服膺启夫子》一书,启先生已经在我心目中成为老师。

同样的事情,不同的人面对,境界会有天壤之别。若干年前,《启功书画集》的首发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是一般讲话加发言加照相的形式。来宾有领导、书画界大佬、社会活动家等。启功应要求,坐在主席台的大沙发上。仪式近3个小时,别人都深深地坐着,只有启功抱着拐杖,始终跨一个沙发边儿。

这样谦虚和恭敬的态度,好像小步急趋的古礼。所谓夹尾巴,是做人神经强健的特征。启功以前留给我的都是和蔼的微笑,现在则多了个谦卑的坐姿。

启功不是装,是真谦卑。别人给启功来信,觉得有过分的敬称,他就将原信敬称字样剪下寄回,回信讲明“敬望”。这个谦己的办法已很少有人用。

启功永远自居于教师,他自己做过一种名片,只有自己题写的两个字“启功”,干干净净。那些表明自己身份的所谓头衔居然一个都没有。

启功的谦卑是把自己摆得很低,给人题字会用“启功敬题”,黄苗子先生曾经对启先生抗议说,什么人物,也值得您“启功敬题”?其实,启功并不是所有场合都“启功敬题”,只是比黄苗子的标准宽些。事情有些个界限,做化一些,放宽一些,灵活一些,是启功的做法。他并不当面反驳黄,而是诙谐的说,我改名叫“启功敬”了。



启功嘻嘻哈哈中表达了自己的见解。他用笑容和幽默化解。可见,在启功身上,谦卑不等于木讷。

现在很多所谓文化名人,根本不听你

说,直接就说自己最高;或者伶牙俐齿,旁人一句话问不到点子上,回一句话不是要把人直接噎死,就要把人挤兑出眼泪来。丝毫没有幽默感,丝毫没有宽容度,貌似眼里揉不得沙子,实际上是做人修养还不够,而像启功这样的大家,却从不以大家自居,而是用加倍自谦以至自贱的办法,这样做只能是依凭文化,相信传统“不争”的指挥。

还有一个故事更有趣。上世纪80年代国门初开的时候,启功随团到香港一工商巨子的府上出访。进门人家就给每位一个红包,首先就派启功一个。启功笑盈盈双手接下,口中称谢,随同也就依样接下。香港人家也都供奉一个佛龛,在访问结束的时候,启功来到这家佛龛前。口称吉祥,将红包献于佛前,随同于是依样拜一拜,奉上红包。

这个故事显示了启功谦恭背后的人生智慧,不愿意接受人家钱财,但受礼是承情,敬神是恭敬。自爱与自尊,是在随与通达中显露的。

启功也会拒绝。他92岁生日时,学校搞庆祝仪式,发言献礼刚完,忽然听得生日歌起,几个女孩子手捧烛火缓缓列队而进,最后站在夫子面前,歌唱唱出一半,启功已经没有心情听下去。作者亲眼见到启功虽然起立鼓掌,脸还是沉了

来。待歌曲唱完后,夫子说了两句就匆匆退场。

还有77岁这一年的夏天,启功被要求在英模报告会上讲话,终于到了说不上来的时候,就对大家说:我来前没有准备,给大家敬个礼吧!然后站起来,把手搭在眼边儿上,给大家敬一个礼。然后肃穆坐下。

晚辈鼓掌,觉得新鲜。有晚辈上来说,您老还会敬礼呢!启功自嘲说,这也是急中生智:用典。四十年代张寿臣给人家叫唱堂会,没有能唱的戏码,就说:我给大家学个口技吧!就学几声狗叫声吧。

人情与世故,最难掌握的是分寸。启功言行当中的敦厚温良、谦卑灵活的处世之道,来源于传统文化的浸淫,来自于不断完善和提升自己的品格与内心。

此书的作者李可讲在本书的最后有这样一段感慨:“对于夫子,我觉得不是追捧的热情,是心智的佩服、佩服、佩服,因为了解了夫子的处境和意气,深深佩服夫子的想法和做法,并依葫芦画瓢。”有朋友说,李可讲“自称早年是一个狂妄之徒,接触启功先生后,耳濡目染,才幡然省悟。”《服膺启夫子》的副标题“揣摩启先生的人生智慧”,让我相信,“夫子”之德,正在被延续下来。

刘春是一位诗人,他会选择诗人的方式,对文学商品化、产业化下,诗歌全面撤退的现实作出回应。在《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二部)》的腰封上,“探骊一代精英写作与成长,反思汉语创作困局,讲述诗歌江湖纷乱与虚无,追问时代灵魂走向”,四句话道出了长年来萦绕于刘春心中的野心、梦想与荣光。是的,品味《一个人的诗歌史》,我们确实可以“找回”一些东西,“发现”一些东西,“萌生”一些东西。

《一个人的诗歌史》已经出了两部,但刘春似乎没有丝毫完结的意识。“假以时日,第三部和第四部出版后……”在第二部的后记中,他透露了这样的信息。12月18日,我不小心,溜进了他的博客,看到了这样的消息:“住院进入14天,旧病去了,新病又来。这就是人生无常。我已经习惯了小小的病床。”

提起电话,欲说还止,说了也是白说。“我坚定了把一生献给诗歌的决心,即使背离自己的目标还有遥不可及的距离,我也愿意用一辈子去思索、去描画生命、生活与大自然的神奇。在诗神的眷顾之中,我不知道什么是苦和累;面对从内心流淌出来的新鲜诗句,我会一连几天保持着巨大的幸福。”

这就是刘春,这就是他一个人的诗歌史。

没有伟大的读者,就没有伟大的诗人

叶雷

大约10年前,刘春对我说,他想写一本诗歌史。

但《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一部)》真正要出的时候,刘春又忐忑不安:“现在,不是每一本书都可以有读者的”,是的,这些年诗歌确实落寞了,第三代诗人代表人物之一的陈东东为我们描述了近年诗歌与诗人的处境:诗人们是自己来操办一切的,诗人既是诗篇的作者,又是编者和出版者……又是热心和够格的读者,当代诗人还是自己诗歌的批评者,而且充任过几回自己诗歌的批评者……

刘春写起东西来,是讲感觉的,是不要命的。《幸福像花儿开放》写了差不多10年。回忆起那10年,刘春说他没统计自己的作品数目,只知道“写”,中间有高潮,有低谷,有时候一个晚上能够完成一组诗,有时候一年只写10首,但一直坚持着。他写《一个人的诗歌史》也一样,差不多写了10年。他写作的高潮期,正是妻子黄芳怀孕、生育的关键期,但他每天下班回到家,第一件事

依然是打开电脑,吃完晚饭第一件事,同样是开电脑,直至深夜。

正如著名文学评论家、《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李敬泽说得那样:“没有伟大的读者,就没有伟大的诗人;好诗被写出来,但只有在热情、沉静、敏感的阅读中才能活下去,被领会、记住和流传。”刘春之所以以生命的写实为诗歌作证,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诗歌史》期望很高。他曾说:“要向爱伦堡写《人·岁月·生活》那样写一本书,向这些亦师亦友的前行者致敬,让更多的读者分享他们的痛苦与光荣。”

为了一个时代的光荣和梦想。历史不能成为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无论是《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一部)》中写的顾城、海子、于坚、西川、欧阳江河5位诗人,还是《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二部)》中写的柏桦、王家新、韩东、张枣、黄灿然5位诗人,为了避免出现时间和事实上的硬伤,刘春都把稿子分别发给了这些诗人阅读、校正。由于海子和顾城已经去世,写海子的一文则请海子的挚友西川帮助校订,写顾城的一文便由顾城的姐姐顾乡帮助校订。

读书识人

高宝军:陕北的歌者

他的故乡是陕北。他把陕北说得真切,说得通透,说得由表及里,说得深入骨头缝儿里,说着说着气就提起来了。

他说陕北女子,“在陕北,到处都能看见俊女子。村口路畔上,街头巷尾间,你会看见她们一个个端格婷婷身材黑格幽幽发,白格生脸蛋齐格蓬蓬牙,红格当当地颧骨稍稍上扎,毛格簇簇眼睛会说话——这些陕北女子,牵挂在陕北男人宁愿在黄土地上刨达一辈子,也不愿离开半步。”他说她们相貌好:“陕北是山区,出门就爬山,抬腿就翻沟,这些女子从小就在山上玩耍,大了在山上干活。喝山泉水,吃新鲜粮,长得红是红,白是白,红得美丽,白得干净。”他说她们的脾气:“陕北是一个封闭保守的地方,她们从小就接受传统教育。一过十四岁,母亲对她们的管教就更加严格,要她们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吃饭有吃饭的姿态,说话有说话的分寸。坐着时不能叉开大腿,端碗时不能把碗底坐在手掌上,喝汤时不能端着碗边大口喝。外面有人喊家里人,只要有男性在,她们就不能飞奔出去答应——如有不对,父亲就训导她们没有稳重气。”他说她们的性格:“陕北女子美,美在她们含蓄沉静。有十分的能耐,最多只说五分,有时连一分也不说,硬是自己往低里说。明明精明精明,眼睛会说话,你问她什么,她会说‘不晓得,解不下,我愁着呢’。明明拥有许多东西,她偏说‘一丝丝,一点点’。别人一夸就反驳‘快不要笑话了’。那声调、情态,朴实可爱。”

比世界先要比女人。相比于他眼睛里的陕北女子,现在许多都市中的女人



人,简直像社会机器生产线上批量生产出的复制品:时尚,趋同,乏味,心智唯高却难脱俗套,连化妆和声调都同出一辙。她们的生活片段一经剪裁就是杂志广告——奶油蛋糕就是这样生产出来的:蛋糕的坯子,加奶油,加花饰,加金粉,加点睛之笔,经过多次雕饰和修正,形成经典的假象。

不仅对陕北女子的描述,高宝军的整部《大美陕北》渗透了原始的朴素和传统的素质——它正是从黄土高坡来的原汁原味,它克服了现代都市人内心中被遗忘和屏蔽的盲区:率真的心,血里的随性,和引向深入内里的一派天然存在。它有与生俱来的黄土民族的属性,也有时代所稀缺的安稳与实在,更有世界迅速变化时的固执与坚守,以及乱花迷眼时的对那一点人性本真的把握。它以不变应万变。

文化是什么?可以是自然。一条蜿蜒走向时的变化斑纹,留一个幻像,一寸一寸的姿势改变,无声的动态;可以是道德。杀羊时的一点点仁慈之心,

农历不亡,民间传统就不会断

本报记者 张黎姣

西北一户农家的日常生活,在郭文斌看来是活在民间的传统。他更进一步相信,这种渗透在中国人生活习惯里的传统,其实是“民族的命根”。

用带着西北味儿的口音谈起他的长篇小说《农历》,这个宁夏男人表示:“作为人,完成孝道是第一功课,我把《农历》的写作视为一次行孝。”

历时12年创作完成的这部小说,以农历节气为序,集中用其中的15个节日来讲故事。而他选择用农历节日作为人们生活的节点的,原因是:“农历”是中华民族的根本,而“农历”中的节日,无疑是中华民族的脊椎,也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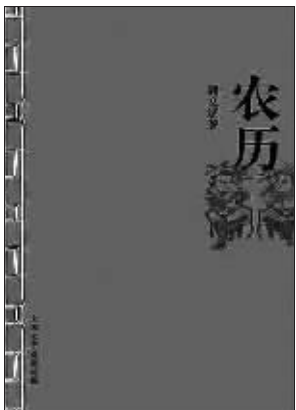
作为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得主,郭文斌想透过《农历》来探究民间传统的重要之处。“我认为,中国文化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经典传统,一部分是民间传统。经典传统固然重要,但民间传统更重要。因为经典只有像水一样化在民间,才能成为大地的营养,否则就只是一些句段。”

郭文斌觉得,经典传统是可以断裂的,但是民间传统不会断裂。焚书坑儒时代,经典传统断裂了,但是民间传统没有断裂;文革十年,经典传统断裂了,但是民间传统没有断裂。

如此说来,我们还能不能回到“农历时代”?“我们可能无法回去,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找回‘农历精神’。”郭文斌说,“我奢望能够写这么一本书:它既是天下父母推荐给孩子的书,也是天下孩子推荐给父母读的书,它既能给大地增益安详,又能给读者带来吉祥,进入眼帘它是花朵,进入心灵它是根。我不敢说《农历》是这样一本书,但是我按照这个目标努力了。”

郭文斌把《农历》的写作视为一次对天地,对岁月的深深敬礼。“农历”的本质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这个成语一向被人们讲得很玄,在郭文斌的理解中,其实是回到母亲的怀抱。他用一个个故事来表达自己对的天人合一的理解:当年曾参在外打猎,心突然疼了一下,心想是母亲出事了,忙跑回家,不想娘没事,是朋友来了。原来母亲为了不让朋友久等,就咬了一下她的手指头,曾参就感觉到了。郭文斌说:“这个故事,人们常常用来讲孝,但在在我看来,就是讲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本质上是儿子的频道和母亲的同步。”

春节期间,天南海北的人都要不顾一切的回家过年,郭文斌认为,事实上这就是一个人潜意识中的“返乡”情结,“归属”情结。有母亲在的地方就是故乡,有年年的地方就是老家。这个母亲,既是生我养我的母亲,也是“大年”,也是“农历”。



自治读本

说来可怜,偌大一个出版大国,十几年来出版的关于自治的书目,可检索到的,乏善可陈。

这种现象,其来有自。传统中国,是一个没有个人的社会,只有家、族、国,所以,举凡带“自”的词汇,都不怎么招人待见,比如“自由”、“自己”、“自留地”,当然包括“自治”。你怎么可以有个人(自)呢?你怎么可以不理、不理、不理呢?当然包括“自治”、“自留地”,当然包括“自治”。你怎么可以有个人(自)呢?你怎么可以不理、不理、不理呢?当然包括“自治”、“自留地”,当然包括“自治”。

最近,王建勋博士编了一本书,列于何怀宏先生主编的“大家西学”里,比较扎眼,名曰《自治二十讲》。可算是多少年来第一本专谈自治的书,尽管是西方历代学人有关该话题讨论的选编。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自治在西方源远流长,从理论到实践。据史学家赵树峰者,中国的东、明,就有社会自治因子,可惜没有流传下来。中国人第一次大规模探讨自治,是百把年前的清末民初。好景不长,自治浪潮转瞬即逝。原来,据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们说,百年前的自治呼喊和急速实践,是汉人反对外族统治的一种姿态,它不是中国人骨子里的理念和冲动,所以,一旦“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目标实现,它也就被根深蒂固的“大一统”渴望给淹没的踪影全无。此后再无回响,直到二十年前开启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大风刮遍各村寨。1997年,徐勇先生的书,差不多是最早探讨该话题的成型著述。

2006年,美国人威布《自治:美国民主的文化史》出版,在读书界引起反响,读书人开始顺藤摸瓜,第一步摸到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原来,在托氏那里,自治却是民主的基础。还可以往上追溯,比如18世纪启蒙学派,也有类似论述。